

修建莫索湾大渠

1956年,15岁的我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河南省青年军垦队,支援边疆建设,来到新疆石河子安集海。第二年冬,我参加了开发莫索湾的先遣队。我们背着背包,跨上槽子车,顶着凛冽的寒风,奔赴莫索湾。

这是一片亘古荒原,没有道路可走,一辆链轨车在前面披荆斩棘,趟出一条路。

到达驻地后,我被分配到莫索湾工程队,没有住房,就地搭帐篷。寒冬腊月,被雪浸泡的手一碰到搭帐篷用的螺丝帽就被粘住了,一扯就撕下一块皮。寒冷的夜晚,帐篷里只有一个小铁炉,我和战友们轮流用梭梭和红柳枝烧火取暖。用水就更困难了,我们用大铁锅把雪融化后,捡出水中的梭梭枝和黄羊粪,一人一杯,用来洗脸刷牙。就这样,我们度过了初到莫

索湾的第一个冬季。

我们先要解决70万亩土地的水源问题,年终岁尾,修建莫索湾大渠的战斗打响了。我当选为突击队队长,带领战士们向冻土开战。当时的气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,战士们的头发、眉毛、衣服上挂满了冰雪,身上却热气腾腾,汗流浹背。

我所在的工程地段是红胶土,红胶土一上冻,比石头还硬,十字镐挖下去,只留下一个白印,战士们有的手上磨出了血泡,有的虎口被震裂,一根根镐把被震断,一把把钢锹用得卷刃,可工程进度就是上不去。我心里很着急,于是想到了打擂台。我先挖土10立方米,当上了第一个擂主。不出意料,马上有15个人参加打擂台,功效立刻提高了80%。擂台赛使大家干劲倍增,最后,我们突击队

完成任务192%,获得了一面战斗红旗。

如何提高工效进度呢?我发现战士们烤火取暖的地方,坚硬的红胶土地被烤化了,这一现象让我灵机一动。在下班前,我组织一部分战友按照工程路线堆放树枝并点燃。经过一夜的烘烤,上面的冻土软了,第二天我们立即开挖,挖到地面1米以下时发现,冻土层没了,挖起来更容易了。

就这样,我创造的“挖空冻土、下层掏暖土”的方法,传遍了修渠工地,各工程队纷纷效仿,工程进度一下提高了10倍。树枝燃烧后留下的地方黑乎乎的,犹如一只黑色的老虎,大家就给这种工作方法取了个美称,叫“黑虎掏心”。

苦干、巧干、带头干,大家的劳动竞赛热情高涨,还说我

可以与唐代名将罗成相媲美,送我一个雅号叫“小罗成”,并封我为擂主。

“哗、哗、哗”水来啦!26公里长的渠道工程,经过一个冬天的鏖战,提前两天竣工了!胜利的喜悦像长了翅膀似的,从渠首传到下游的开荒工地。这一天,大渠上下,盼水、迎水的人们欢声雷动。有的提着马灯,有的举着火把,有的燃起堆堆篝火,一直等到深夜,谁也不愿离去。

这一年春天,莫索湾二场播下了86000亩粮、棉。我们获得了“当年开荒、当年生产、当年有利润上交”的锦旗和自治区奖励的汽车、机床。我被评为农八师优秀共青团员,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“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”,并授予“五四火炬奖章”。

马大生/口述 陈玉氏/整理

图说往事



春节时拍结婚照

1966年初,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公社武装部上班。到了农历腊月廿九上午,我和对象到民政部门领了结婚证。第二天就是春节了,我俩打算上午去拍结婚照,可公社领导让我带队外出去开会。

春节那天上午,我带着队伍到了开会的地点。会议结束后,我和对象才有时间去照相馆照相。当我俩来到照相馆门口时,看见大门落锁了。一问才知道,摄影师就在照相馆后边住。我们找到他,和他说明情况后,对方二话没说,就领我们去了照相馆,拍了这张结婚照。

史学敏/文并供图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童年的冰车

儿时,我住在山东淮北白浪河畔华疃村的姥姥家。那时,冬天特别寒冷,尤其是下过几场大雪后,伴着凛冽的寒风,村内的湾塘、村外的河流和脚下的大地,都是冰冻三尺,坚硬如石,给我和小伙伴创造了滑冰车的好机会。

冰车是姥爷做的。姥爷把家里的一条旧坐凳修理成一块长方形木板,然后在其底部钉上两条鼓鼓的木制凸槽。接

着,找来两条独轮车辐条,再到老槐树上砍下来一条树枝,制作了两把长长的木把铁尖锥子。冰车做成了,我高兴得欢呼雀跃,就想着早点和小伙伴们一起玩。

滑冰车的确很有意思,小伙伴们或蹲或坐在冰车上,两只手拿着铁尖锥子,狠劲儿地向冰面上滑动,以形成强大的动力,推动着冰车如梭般前行。当冬日的狂风卷着漫天飞雪、

把河面冻成厚厚的冰层时,就迎来了玩冰车的好时机。

我自幼胆子就小,刚开始时自己不敢滑冰车,就经常坐在小伙伴或弟弟的冰车上,让他们滑着冰车带我玩。我紧紧搂住他们的腰,眯上眼睛,顿觉冰车如箭一般,“嗖嗖”地疾驰向前,让人无比惬意,对身边的冷风毫不在乎。我每天都玩到很晚才回家,终于学会了自己滑冰车。

那时,乡村生活极为贫乏单调,滑冰车或看滑冰就成了冬季一道热闹的风景,很多人经常聚集在河塘边看我们滑冰车,不时地喝彩加油,使整个河塘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当下一个冬天到来后,河塘里又传来伙伴们滑冰车的欢笑声。当年那些欢快热闹的场景,成为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。

刘剑侠/文

我曾经是位“说书先生”

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,那时我12岁,在成都“铁三小”上初一。那个年代,学生的课余生活哪像现在的孩子这么丰富——有手机、电视和各种书籍,而我们能有一本课外书看看,就是十分奢侈的事儿了。

当年,家父在部队宣传部门任职,单位里有一些“仅供批判”用的“反面教材”,其中就有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文学名著。这类书籍都是蓝色封皮,扉页上都注明“仅供内部使用”“批判用书”等字眼,在书店和图书馆里是绝对看不到的。

受父母的影响,我从小就喜欢文学,但平时又很难如愿以偿。家父有时为了方便“批判”,就将这类书籍带回家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我见到这些古典名著,如久旱逢甘雨般地喜欢,但又不敢拿到学校,怕被同学“举报”,所以只能在放学回家后,趁家长不在,偷偷地躲起来看。

书读的多了,也就记在心里了。节假日不上学,同学们在部队大院里玩耍。当年,我是个生性木讷、腼腆的少年,但想起书中的故事情节,偶尔也会忍不住在小朋友中显摆一下。没想到,同学们居然听上了瘾,每次见面,都会缠着我,迫不及待地要我讲《西游记》。我也当仁不让,大模大样地当起了“说书先生”。什么孙大圣称号的由来、大闹花果山、铁扇公主和牛魔王、猪八戒怎么吃人参果等等,我张口就来,当然免不了添枝加

叶。小朋友们围坐在我身边,听得津津有味。回想起来,那种成就感真是美极了!

记得那个时候,家父还会带回家一些苏联当代作家的翻译作品,印象较深的有伊凡·沙米亚金的《多雪的冬天》等,书中如诗如画的异国风光和深刻的思想内涵,令我至今难忘。还有其他一些外国文学名著,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、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等等,书中的主角,如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、于连等都令我这个少年着迷。我是逮着哪本读哪本,也不记得读了多少本。

当然,这类外国作品在当时属于“内部”阅读之列,新华书店是买不到的,限于当年同学们的欣赏水平,这些外国名著不在我的“说书”范畴内。

现在想起来,成年后我下乡当知青,考师范,写小说,当老师,做记者,文字和口才功夫,甚至大庭广众下不再怯场的好习惯,多多少少都来自于当年的“说书”经历。

高越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勤 善 和 谐

人民日报宣传

中国网络电视台